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邹兆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关键词]史学方法;唯物史观;传统治史方法;乾嘉学派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5-0035-06 [收稿日期]2010-12-18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从国外传入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形成过程中,既包括着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整理、批判、吸收和借鉴。这里既包括如清代乾嘉学者的传统治史方法,也包括近代学者的新考据学治史方法。这种融汇,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趋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史学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

一、给传统史学方法以科学地位

唯物史观本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研究历史的引线”、“研究历史的指南”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等,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特性。这一点确实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建立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上的基本方法,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了。但是,唯物史观的运用也必须与各国、各民族史学研究的具体传统相结合。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治史方法相结合,才能真正把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这种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史学研究的效能,也能够避免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过程中产生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使唯物史观真正起到研究“指南”的功用。

中国是史学遗产极其丰厚的国度。这不仅包括

两千多年来所积累的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学工作的遗存,也包括近代以来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那些所有史学者共同作出的杰出贡献。充分继承和弘扬史学遗产,为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就必须对这些史学遗产作系统的研究及分析、整理,并且给予其科学的合理地位。

白寿彝于1983年就提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他指出:“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1]白寿彝这里所讲的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强调要把唯物史观的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学遗产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来没有排斥或贬低传统史学家的治史成就,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以他们的成就为出发点。当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经高度赞扬了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王国维的“遗书”“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

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2] (P7-8)}。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又指出,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必须沿着前辈学者所开创的路数继续拓展下去。

但是,由于曾长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对前人史学方法的梳理和研究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对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一直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冷遇。而人们所期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又没有形成,具体表现就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过一本史学方法论之类的教材和著作,所以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未能真正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正梳理、研究、吸收前人的史学方法还是在19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开始重新思考传统史家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成就。白寿彝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些历史学家,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但在史学研究工作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史学遗产。“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等的成绩都很多,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还是有益的。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文献方面,而他们的学风又各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陈垣先生作出了一些示范的工作,在目录学方面、在校勘学、在避讳学、在辑佚学、在年代学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顾颉刚先生在古书、古史的辨伪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的综合运用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3]齐世荣在《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陈寅恪、陈垣两位先生在考据方面的成就,论述了考据的一般方法,并指出,“考据作为治史的一种工具,过去有用,今天还有用”^{[4] (P388)}。

当前,无论是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还是20世纪以来新考据学家们的治史方法,都在现今流行的各种史学史、史学概论的教材和著作中得到了科学的评价。

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得到了学术界高度关注,普遍认为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是在清初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他们淡化了清初学者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抱负,但在求实精神方面却继承和发展了清初学者的传统。他们强调“一物不知,以为深耻”,把考据方法扩大到历史地理和经史专

门著作的辨析上。乾嘉学派在校注旧史、重订旧史、重辑旧史等方面对史学研究方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史学史类的著作都对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给予了肯定,如张岂之就曾指出,乾嘉考据学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各种考证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司马迁以来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5] (P192)}。

近些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新史学方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诸多学者从多方面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各种著作,不仅总结其学术成就,而且还梳理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论。学术界普遍认为: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视野开阔,认为研究问题要运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理法。同时,需要具有广阔的知识。不仅要有中西历史的基本知识,还要有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在方法论领域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等证传世文献,又以文献证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作过一定研究。

陈寅恪期望根据传统方法的长处结合西方学术方法形成新的史学方法。他在新史学方法体系中最大的贡献是结合考据意识和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学术的思路,开辟了新史学中文化史学的方法途径。他把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化印迹都作为史料,打破了经史子集的局限,形成了广义的史料。他还重视佛经、道藏、神怪小说、笔记野乘、地志药典等。他不仅利用汉文的书籍进行考证,还能参照各种文字资料进行比较,他懂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

陈垣的史学方法论的目标,就是要在全面继承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创造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他在整理和革新传统考据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研究中以碑文、郡书、地志、诗文集和语录为主要史料,以正史、稗史、游记、随笔、杂记为辅助史料,并参用类书、档案、世谱、书谱和信札。他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并且提出史源学。他非常重视工具书,创新历史年代学和避讳学,著有《中西回史日历》和《史讳举例》。同时,他不以考据自居,而且重视史事疏解和思想表微。他把讨论文献版本、目录、考订史实真伪的工作看成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还要在这基础上说明史

实的发生、发展,并揭示其思想价值。

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且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出,要以“历史的眼光”,“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还具体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方法。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把史料区分为原料和副料的主张,认为凡一切社会生活的文献和非文献资料都是史料。在审定史料方面,还提出内考证与外考证的具体程序。在处理史料和史论的关系上,胡适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口号。因为史料总不会齐全的,那没有史料的一段,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

傅斯年在近代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贡献,是他提出了“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发展了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他主张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成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强调历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认为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者以工具。这就意味着,傅斯年明确提出了史学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把历史研究建立在严密的史料考辨和形式逻辑之上^①。

总之,近代学者这种把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力图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化的努力,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认同与高度重视。有学者在评论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亦即“新考据学派”时说:“在这个范式下作业的考据家们,身具深厚的实证功力,内储取之不尽的旧学资源,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观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作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6] P30}

这样的认识基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传统史学在治史方法上的有益成果,建立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创造了条件。

二、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包括的内容比较广,就史学方法论来说即包括史料的搜集鉴别、历史事实

的考证、历史著作的编纂等诸多方面。这里,仅以历史事实的考证问题为中心略加论述。

乾嘉学派史学的历史考证方法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寿彝指出:“乾嘉学派的烦琐学风,我们不提倡,它比明清之际那种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思想上是倒退的,但对整理历史文献的技术方面是有成就的。我们还是应该吸收过去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其中有目录学的、版本学的、校勘学的、辨伪学的、辑佚的、注释的等等。过去这些工作,基本上就是就事论事、就书论书的多。把它们组织起来,条理化起来的工作,过去是作得很少的。我们可以先把过去的已有成绩整理出来,使其便于利用。”^[1]

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对乾嘉以来史学研究范式的研究高度关注。在各种史学概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教材中都作了大量介绍,还出版了不少专门研究乾嘉学者在史学方法论上的成就的著作^②。到世纪之交,不仅有了综合研究乾嘉学派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还有研究乾嘉学派史学代表人物如赵翼、钱大昕、崔述等的一系列著作^③。如罗炳良对于研究乾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投入了大量精力,先后出版了《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等著作。他从乾嘉史学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中钩沉梳理出他们在考证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如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崔述的《考信录》中,总结出他们归纳考证、比较考证、辩证考证、溯源考证、会通考证等考史的具体做法,揭示出乾嘉学派在史料考证上带有方法论特点的共同经验,总结出乾嘉学派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包括归纳演绎考证的方法、比较考证的方法、溯源考证的方法、实事求是考证的方法、参互考证的方法及辩证考证的方法等。对乾嘉学派的这些研究,不仅为当代学人学习、运用其方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史学家所编撰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的著作中,在讲到史学方法特别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以乾嘉学者或

^①参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章第二节。

^②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2001年版)、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祖武、朱彤圆《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③参见赵兴勤《赵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方诗铭《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张涛、邓声国《钱大昕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吴量恺《崔述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近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作为基础。如宁可在《史学理论研讨讲义》中讲到史料的考证问题时,特别推崇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陈垣的《校勘学释例》、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讲考证方法的著作,同时还提到王崇武的《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李如松东征考》、孟森《清初三大纲案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实际的考证作品。在总结前人考证方法的基础上,宁可论述了十一种考证方法,包括本证(内证)、外证(他证)、参证、旁证、反证、默证、理证、孤证、类推证、丐证、证伪等^①。这是对于传统考证方法的创造性发展。

即使21世纪最新出版的史学概论著作,也是把历史学的考证问题作为历史学的“基本层面”来看。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设专章《历史考证:事实的确定》来论述这个问题。但在这里,编著者已经将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考证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了。同时,作者还以王国维、郭沫若、吴晗等史学大家的考证方法为例,提出了考证方法的综合运用问题,如多重证据法、内在和谐原则、演绎推理法、“问答逻辑”等等。

如今,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已经成为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基本技能和素养。

三、对新考据学派方法的创造性应用

对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的研究、总结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治史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则是更重要的事情。

传统的史学考据方法所探讨的对象往往是一些史料或史实上的个别具体问题,现代中国史学家在持续运用传统考据方法在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罗尔纲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经他整理过的太平天国史料,都经过仔细的校勘,去伪存真,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他毕生勤于著述,正式出版的著述达到四十多种,是当代史坛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经他手整理的太平天国史料,粗略估计也要在一千二百多万字。太平天国史料中谬误之多,历史罕见。不认真进行辨伪、考订,盲目依靠这些材料去研究太平天

国史的研究就会陷于混乱。罗尔纲从1930年代开始,即从事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工作。当时,他立志做一个“清道夫”,即通过对史料的辨伪、考证,为后人研究太平天国有关问题创造必要基本条件。

罗尔纲走上搞考证,并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道路与其老师胡适对他的指导分不开。胡适教人搞考证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罗尔纲在胡适这里真正领会了这个原则的要领。搞考信和辨伪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很枯燥,研究者不仅要有能坐冷板凳的精神,还要有“打破沙锅纹到底”的执著。吴晗形容罗尔纲的考证方法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最后把心露出来。而且,他还不以问题解决到是对还是错为止,他还要进一步考证出所以出错的原因,故其考证结果往往让人心服口服。同时,他还要进一步对其所考证的事物(人物、事件)作出评价。所以,其学术成就不仅仅在于考证方面,他还有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著作。1930年代,他就写出《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并不断修订了《太平天国史稿》,而到晚年又有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问世。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中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辨别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给李秀成自述做注释并考证其真伪的工作,可以说伴随着他的一生,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一直在搞。他1931年开始注意到清政府根据李秀成自述抄录的《李秀成供》。1944年,广西通志馆派人去湘阴曾家抄录了自述原稿,请罗尔纲做注释。他于1951年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后于1957年出版了增订本。此后,又不断修改、补充,完成了《增补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于1982年出版。这已花费了他半个世纪的心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在继续搜集资料,不断有所发现,将新的材料、新的注释及时补充进去。直到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了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这已是他六十年严谨治学的结果了。

罗尔纲说,他作考证用的方法,是乾嘉学派用的考据方法。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据证据,实事求是地鉴定史料或史实的真伪,其特征和长处就是务实、严谨和缜密。他强调,在狭隘的范围内,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关系时,还可以应付,一超出这个界限,需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需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认为“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不能遵守乾嘉学派的

^①参见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讲。

严格法则 我已经越过局限 ,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进行解释了。”因此 ,他得出结论说 ,要全面地深入地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 ,就“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这一个武器不可”^{[7] (P3-4)}。正是由于他一方面能够熟练地运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 ,又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法则 ,并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因此能解决一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二重证据法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的研究古史的方法。新时期的历史学家创造性地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取得了巨大的新突破。如苏秉琦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新发现 ,在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上 ,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秉琦是一位考古学家 ,从 1934 年起即从事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从事考古工作。他从事的大量考古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一方面从实际考古工作 ,一方面又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全局观念 ,善于进行理论思维。特别是 1980 年代以来 ,他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 ,就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一些问题的尝试性分析 ,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格局、系统等问题 ,提出了创见 ,并对此赋予了研究方法的意义。因而 ,他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单一中心的“摇篮说” ,建立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具体途径的“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一整套理论。

1981 年 ,他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 ,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作了全局性归纳 ,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 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邻近部分地区、湖北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他认为 ,各个区系都显示了独立发展的明显脉络 ,但又是互相影响的。他的这一理论 ,不仅解释了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差异性 ,建立起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而且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 ,取代了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单一中心起源说。他认为 ,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文明的摇篮并不确切 ,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1980 年代中期 ,辽西地区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绥中到秦皇岛的秦代离宫建筑群等考古新发现 ,他又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 ,恰似“满天星斗”的观点 ,认为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 ,同步或不同步 ,但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

明 ,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1990 年代以后 ,苏秉琦又发表了《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等文章 ,进一步作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统”的宏观概括 ,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 ,“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 ,多元、一统的格局铸就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又说: “重建中国古史 ,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 ,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转折点 ,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于是 ,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这些宏观上的精辟论述 ,形成了他对中国古史的一个系统认识 ,即建立起了中国古史框架 ,阐明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特征。

林甘泉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传统的二重证据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问题 ,作出了出色成绩。1950 年代 ,林甘泉和侯外庐对于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进行了讨论。1954 年 ,侯外庐提出 ,在“中国中古封建是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 ,而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较缺乏的”。侯外庐这里所说的“皇族土地所有制” ,实际上也就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侯外庐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很大轰动 ,有人赞成 ,也有人反对。1957 年 ,林甘泉发表了《试论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一文 ,与侯外庐进行商榷。1963 年 ,林甘泉又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一文 ,肯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 ,而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 ,此后他就对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研讨。

林甘泉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其形成过程的研究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 ,主要是实践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利用地下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互相印证。例如 ,1975 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一批周共王时期的青铜器 ,这些铜器的铭文就是研究西周土地关系的珍贵资料。《文物》1976 年第 5 期发表了这批铜器的发掘简报 ,林甘泉写了《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读岐山董家村出土铜器铭文》 ,与简报同时发表。在这批青铜器的《卫盂》、《五祀卫鼎》、《九祀卫鼎》的铭文中都有关于土地转让的记载 ,但是不是土地自由买卖的证据呢? 他认为 ,从铭文上所反映的土地交换 ,只能说明西周中叶以后 ,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已经日益明显 ,但这种土地交换还带有相互馈赠的性质 ,并非属于商业行为的土地交易。

1986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一文,利用出土文物对土地制度史作了进一步研究。由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书《孙子兵法·吴问篇》和《田法》,对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关系的变动有重要意义。另外,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的《田律》也有土地制度的反映。他认为,《田法》中所说的“三岁而壹更赋田”,就是三年更换份地的制度,州、乡的耕地根据美恶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授给各家农民耕种。但从《吴问篇》的记载中也能看出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在迅速发展,许多农民家庭实际占有的土地已经超出原有份地的面积,所以“百步为亩”的亩制也被突破了。有的以一百六十步为亩,有的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些新贵族势力扩大亩积,正是适应了土地私有化发展的要求。

正是由于运用了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他的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90年,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出版,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现体现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方法的进步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特别是在方法论的继承与创新上有了很大进展。当今史学家在从事史学

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坚持与唯物史观密切联系的基本史学方法之外,还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使这些方法的效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了更大成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一步梳理、挖掘、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逐渐形成一个系统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体系。同时,认真总结几十年来新史学家们在运用传统史学方法上的实践与创新,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方法论体系必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白寿彝. 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A]. 白寿彝史学史论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 [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3]白寿彝.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J]. 史学史研究, 1981(2).
- [4]齐世荣史学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5]张岂之.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6]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7]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自序[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Wa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ZOU Zhao - chen

(School of Histor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9 ,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a's Marxist historians is full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which insists on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materialism and also absorbs China's traditional ways of historiography , including some ways from non - Marxist historian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boosts up the studies on historiograph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enriches and promotes the wa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wa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views of materialism; traditional way of historiography; Qianjia School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